



学术文丛

中
国

美学文化

导论

葛榮晉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B2
78



学术文丛

中
国

美学文化

导论

葛荣晋

著

中共 中央 党校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实学文化导论 / 葛荣晋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

(学术文丛)

ISBN 7-5035-2609-2

I . 中… II . 葛… III . 实学-哲学史-中国
IV .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3192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三河燕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28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5.00 元



葛荣晋，1935年
生，河南省济源市人。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从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中国哲学与东亚实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学术专著有《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国哲学范畴史》、《中国哲学范畴通论》、《儒道智慧与当代社会》、《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谋略》等；合著有《陆世仪评传》、《清代社会与实学》、《一代儒宗顾亭林》等；主编有《明清实学思潮史》、《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实学思想史》、《韩国实学思想史》、《张载关学与实学》等。另外，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著作屡获国家图书奖、全国、教育部和北京市的优秀学术著作一、二等奖。被收入国内外各种名人录。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实学引论	(1)
一 中国实学的内涵	(1)
二 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	(9)
三 中国实学的时代范围和历史阶段	(13)
四 中国实学和宋明理学	(17)
五 中国实学的现代转换	(20)
第二章 宋代实学的历史演变	(24)
一 北宋“重功利，求实用”的达用之学	(25)
二 南宋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27)
三 南宋“务实不务虚”的事功之学	(33)
第三章 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	(36)
一 儒学的复兴与安定学派的产生	(36)
二 “经义治事，以适士用”	(41)
三 治经“必论其大体，其章句细碎不足道也”	(47)
四 “治己而后治乎人”	(53)
五 “为文章，皆传经义”	(56)
第四章 张载关学与实学	(60)
一 历史的回顾与实学研究方法的引进	(60)
二 张载“关学”在本质上是“实学”而不是 “理学”	(62)

三	张载关学与明清实学	(71)
第五章	二程“洛学”与实学	(87)
一	实理论	(88)
二	“性即气，气即性”	(93)
三	“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95)
四	“经世济物”	(99)
五	“治经，实学也”	(102)
第六章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107)
一	实理论——“吾儒万理皆实”	(107)
二	实性论——“人之性本实”	(114)
三	实功论——“著实做工夫”	(117)
四	实践论——“必践于实而不为空言矣”	(122)
五	经世论——“经世济物”	(125)
第七章	明清实学概论	(130)
一	明清实学概念的由来	(130)
二	明清实学的特征、种类和历史阶段	(133)
三	明清实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138)
四	明清实学的历史地位	(142)
第八章	明清社会的变迁与实学思潮的演化	(145)
一	明清实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	(145)
二	明清实学的鼎盛时期	(149)
三	明清实学的衰颓时期	(154)
四	四点启示	(161)

第九章 明代朱学与元气实体论	(163)
一 薛瑄、曹端的“理气一体”说	(163)
二 罗钦顺、王廷相的“元气实体”论	(167)
三 韩邦奇、崔铣、杨慎的气论思想	(176)
四 吴廷翰、高拱的气本论思想	(181)
第十章 晚明王学的分化与气实体论的发展	(189)
一 蒋信、王道的“本于一气”的思想	(190)
二 唐鹤征、杨东明的理气统一论	(191)
三 刘宗周、黄宗羲的“盈天地间一气”的思想	(200)
第十一章 明清实学对宋明理学伦理思想的批评	(209)
一 以实性论批评虚性论	(209)
二 以实修论批评空悟虚静论	(217)
三 以道德实践论批评道德空谈论	(220)
第十二章 明清实学与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	(227)
一 由重道德价值向重物质价值的转化	(227)
二 由重群体价值向重个体价值的转化	(234)
第十三章 “西学东渐”与中西哲学的交流	(241)
一 西方哲学的传入与中西哲学的冲撞	(241)
二 中西哲学的融合与明清实学的发展	(253)
三 三点结论	(259)
第十四章 清初的经世实学思想	(260)
一 历史的呼唤与经世实学的兴起	(260)
二 经济层面的经世思想	(269)

三 政治层面的经世思想.....	(281)
四 文化层面的经世思想.....	(291)
五 “史学所以经世”	(298)
第十五章 清初朱学的复兴与特征.....	(309)
一 时代的选拔与朱学的复兴.....	(309)
二 实学思潮的高涨与朱学的实学特征.....	(312)
三 “西学东渐” 与朱学的开放品格.....	(316)
第十六章 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之学”	(320)
一 驳斥宋儒的“凿空之弊”	(320)
二 以训诂求义理.....	(323)
三 “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	(326)
第十七章 晚清经世实学.....	(330)
一 道、咸年间的经世实学.....	(330)
二 同、光年间洋务派的经世实学.....	(338)
三 晚清经世实学的两重性格.....	(343)
第十八章 中国实学的现代转换.....	(346)
一 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	(347)
二 “兴利除弊”的“经世”精神.....	(348)
三 以民为贵的“民本”精神.....	(349)
四 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351)
五 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	(352)
第十九章 明清实学与中国“近代指向”	(356)
一 本末轻重之辩与资本主义.....	(357)

二	“四民”之辩与资本主义.....	(362)
三	公私义利之辩与资本主义.....	(370)
第二十章 “格物”说和中国科学的发展.....		(376)
一	程朱“格物”说的双重涵义.....	(376)
二	明清实学家的“格物”说与中国古典科学的发展.....	(383)
三	“西学”的输入和近代的“格致之学”.....	(390)
第二十一章 实心实学的现代社会价值.....		(394)
一	“实心实学”的内涵.....	(395)
二	“实心实学”与市场经济.....	(397)
三	“实心实学”与科学技术.....	(400)
第二十二章 中国实学研究及其前瞻.....		(404)
一	中国实学研究的兴起与成就.....	(404)
二	中国实学研究的几个争论问题.....	(409)
三	实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413)
四	21世纪实学研究的总体构想	(415)

第一章

中国实学引论

为了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实学，对于中国实学的内涵和外延、主流和核心、时代范围和发展阶段、实学和理学的关系，以及它的现代价值和转换，作一扼要说明，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实学的内涵

什么是“实学”？这是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也是最难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

“实学”这一概念，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涵义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因学派相异，也往往对其有不同的诠释。但是实学家在同“虚学”的辩论中，总是把自己的学说和思想称之为“实学”，或者彼此以“实学相期许”。从北宋以降，许多学者都用“实学”这一概念说明和概括自己的思想和学说，这一概念并不是我们现在主观杜撰的哲学范畴。

宋元明清时期，学者对“实学”所赋予的内涵，大体上是从“实体达用之学”的意义上使

用的。实体分为宇宙实体和心性实体。我们先从宇宙实体说起。

宇宙实体是“实”还是“虚”？道家推崇“以无为宗”，佛教则主张“以空为宗”。程朱学派在同佛、老的空无之说的辩论中，认为“理”作为宇宙本体或本原，是“实理”而非“虚理”，赋予“实学”以“实理”的含义。朱熹发挥程颐的实理论思想，认为《中庸》一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中庸章句序》）很明显，这里是从理一分殊的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来说明实学的。在程朱看来，“理”不只是宇宙万物的“根实处”，也是寓于宇宙万物之中的实有之理。从实理论意义上，程朱学派有时也把自己的理学称之为“实学”。如南宋真德秀根据“即器以求之，则理在其中”的原则，指出“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虚之见，非吾儒之实学也”。（《真西山文集》卷三十）

明中叶以降，许多进步学者在继承实理论的同时，也自觉地批判理学末流的“空寂寡实之学”，往往把自己的元气实体论说成是实学。如罗钦顺针对“禅家所见只是一片空落境界”的虚无之说，指出：“盖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则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后理之一者可见。既有见矣，必从而固守之，然后应酬之际或无差谬，此博约所以为吾儒之实学也。”（《困知记》续下）这里，罗钦顺所讲的“理一分殊”不同于程朱，是建立在气一元论思想基础之上，实际上是“气一分殊”，这是他的“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思想的另一种表述。王廷相作为明代最大的元气论者，针对佛、老和理学末流的空虚之学，自觉地把从张载那里承袭下来的元气实体论说成是“实学”。他说：“《正蒙》，横渠之实学也。”（《慎言·鲁两生篇》）他在《慎言》中又说：“二气感化，群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以生也，非实体乎？”“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

王夫之也讲元气实体，他说：“阴阳一太极之实体。”“所动所静，所聚所散，为虚为实，为清为浊，皆取给于太和𬘡缊之实体。”（《张子正蒙注·太和篇》）戴震在本体论上也承认“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孟子字义疏证》）他们都是把元气实体论作为中国实学的哲学基础，从而为明清实学家反对理本论和心本论中的虚无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武器。

由宇宙实体进入心性实体，有的学者也把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宋代学者在同佛、老的“以心为空”的辩论中，认为“吾儒以性为实”，承认人的心性“以其体言，则有仁义礼智之实；以其用言，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实。”人的心性并不是空的，而是先天赋予的仁义礼智等道德伦理实体，“仁义者，人之本心也”。明清实学家在反对宋儒的性二元论过程中，承认天命之性就存在于气质之性中，离开气质之性的天命之性是“无形影可以摸索”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元代吴澄把心性之学称之为“身上实学”，认为“不言性命，则无以明实学之原。”王夫之指斥王阳明后学“废实学，崇空疏”，也是从王学“蔑规模，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于无忌惮之域”（《礼记章句》卷四十二）这一心性实体意义上来说说明实学的。在道德修养上，是鼓吹空悟论还是实功论（实修论），也是心性之学的虚实之辩的重要内容。宋明实学家多从实功论或实修论的角度来阐述实学的内容。如宋代陆九渊主张“在人性、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逐事逐物考究磨炼”；真德秀强调“就事物中求义理”，才是“着实用力之地，不致驰心于虚无之境也”（《真西山文集》卷三十）。

王廷相主张“内外交养，德性乃成”，提倡在“人事着实处养之”；王阳明提倡“实地用功”、“切实用力”、“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黄绾主张“在实言、实行上做工夫”；唐鹤征主张“悟前悟后，凡

有实功，皆实际也”；孙慎行提出“日用人伦，循循用力，乃所谓实学”——以上这些说法，都是提倡道德修养必须“着实做工夫”，反对离开社会实际的“终日端坐”的“空悟”论。通过实功而进行心性修养，目的不在于空议，全在于“实行”、“实践”。朱熹发挥儒家的“重行”思想，主张“必践于实而不为空言”，批评“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陆九渊主张“为学有讲明、有践履”，“一意实学，不事空言”，认为“躬行践履”即是“唐虞三代实学”；张栻认为“圣门实学，贵于践履”；清初易堂九子针对言行不一的假道学，提出“核名实、黜浮假、专事功、省议论”的“有用之实学”；清代陆陇其认为“大抵天下无实行之人，则不成世道，然实行必由乎实学。”——上述学者都是从躬行践履意义上规定实学内容的。实性论（实心论）、实功论、实践论是心性实体学说的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根据儒家的“内圣外王”的原则，宋明实学家认为必须由“实体”转向“达用”，将“内圣”之实体转化为“外王”之实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圣人。所谓“达用”，在实学家那里，又有两层涵义：一曰“经世之学”，即用于经国济民的“经世实学”；二曰“实测之学”（亦叫“质测之学”或“格物游艺之学”），即用于探索自然奥秘的自然科学。

从“经世之学”意义上使用“实学”概念，是中国实学的基本内涵。现略举数例如下：

南宋吕祖谦发挥金华、永嘉、永康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在驳斥“章句陋生”的“徒诵诂训”时指出，“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吕东来先生文集》卷一）

明初理学家薛瑄极力反对俗儒“滞于言辞之末”，主张“读圣贤书，句句字字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续读书录》卷三）他还从“经世即实学”的

角度称赞北宋经学大师胡瑗说：“昔胡安定教授苏、湖间，因人成就，故弟子见用于当时者，或治水利，或治学术，皆有实用。”（《薛文清公文集》卷十五）

王廷相针对明中叶士人“专尚弥文，罔崇实学”的时弊，明确指出，“士惟笃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大力提倡“明道、稽政、志在天下”的“经世之学”（《石龙集序》），认为“文事武备兼而有之，斯儒者之实学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

吕坤针对晚明士人“学不适用”的弊病，一再指出“实学也，有用之学也。”（《杨晋庵文集序》）

陈子龙针对晚明“擷华而舍实”的恶劣学风，编印《皇明经世文编》巨著，纠正“士无实学”之弊，以达到“资后世之师法”的目的。

清初顾炎武基于理学末流空疏亡国的教训，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大力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卷七）“修己治人”即是内圣型的经世之学。

清初陆世仪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冲击下，亦提倡“经世之学”，指出“凡以教天下之士，务为实学，使处处皆有裨于世。”（《张汉思时政议论要序》）

清初潘耒为梅文鼎论著作序时，亦指出，“古之君子不为无用之学。六艺次乎德行，皆实学足以经世者。”（《梅氏丛书辑要·方程论·潘序》）

颜元针对明清“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认为“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提倡“惟在实学、实习、实用之天下。”（《存学编》卷三）

清末学者朱一新在回顾与总结清初经世之学时，指出，“亭林、桴亭皆重实学，皆主经世。”也把实学看成经世之学。从“实测之学”意义上来说“实学”概念，亦略举数例如下：

宋明时期，探索宇宙奥秘的自然科学，被学者称为“天地动植之学”或“格物游艺之学”。明清之际，方以智受到“西学东渐”的思想影响，把自然科学说成“质测之学”。清代阮元赞扬近代的实测精神，提倡“算造根本，当凭实测”。近代学者多以“格致之学”称谓从西方传入的近代自然科学。

徐光启在谈到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泰西诸君子”时，指出，“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泰西水利序》）这里所谓“实学”，既包括从西方传入的“格物穷理之学”（如物理学等），又包括从西方传入的“象数之学”（如天文、数学等）。

李之藻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也把“西洋历法”说成实学，指出西学“总皆有资实学，有裨实用。”

阮元把中国古代的“天文算术之学”说成实学，指出“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指‘天文算术之学’）遂微。”（《畴人传》卷四十四《利玛窦》）在评价戴震的古典科学成就时，又指出，自秦以后，“言数者，或杂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气之说，由是儒林之实学，下与方技同科，是可慨已。庶常（戴震）以天文、奥地、声音、训诂数大端，为治经之本，故所为步算诸类，皆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准古作者。”（《畴人传·戴震》）

近代中国随着西学的大量输入，有人欲以西学之实补中学之虚，把西方的自然科学说成是实学。徐珂在《清稗类钞·徐雪村主译西学》中，指出华蘅芳等人“阅数年，书成数百科，于是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王韬在《漫游随录》中亦指出：“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子、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而弗尚诗赋词章。”

在自然科学意义上使用实学这一概念，既包括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算学、奥地、生物、水利等“格物游艺之学”，也包括从欧洲输入的声、光、化、电等“质测之学”，其内涵极为丰富。

除了上述“经世之学”和“实测之学”外，在“达用”方面，还包括有“明经致用”论、“史学经世”论和实事求是的考据实学等内容。

宋明实学家多从“明经致用”的意义上界定“实学”，把经学说成是实学，如北宋社会改革家王安石提倡“经术者，所以经世务者也”，反对俗儒的“离章绝句，释名释教”的空疏学风。

二程从“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的观点出发，提出“治经，实学也”的命题，指出“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一）朱熹发挥程氏的“治经即实学”的思想，反对既溺于文章的“文人之经”，也反对惑于异端的“禅者之经”，主张明道致用的“儒者之经”。

吕祖谦认为，治经如“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清初陆陇其针对“后世训诂记诵辞章之学，夸多斗靡而无益于伦纪”的弊病，指出，“须知吾人不可不敦者，实行；不可不务者，实学。若不从实行上着力，虽然日讲学与不学者何异？与夸多斗靡之学何异？”也是从“明经致用”的角度来诠释实学的。近代左宗棠在《会试卷》中，也主张“经学即实学”的观点。他说：“夫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据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遗，后复拾之，纵华辨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

宋明实学家亦多从“史学经世”的意义上界定实学。从史学具有经世功能这一意义上，也可以把史学看成实学。如朱熹发挥中国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主张“广读经史”，指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寓经世于史学之中。真德秀指出，“善学者，本之以经，参之以史，所以明理而达诸用也”，主张把“性命道德之学”与“古今事变之学”结合起来，以达到经世之目的。

明清之际，实学家发挥元代刘因的“古无经史之分”的论点，王夫之提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洪亮吉提

出“学古为入官之本，前人即后人之师”，都是非常注重史学经世社会功能的。

真正把“史学经世”的思想明确概括成“实学”，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史学大家万斯同。万斯同在批评清代把学术与经济“分为两途”的做法时指出，通过治史，“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烂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实为儒者之实学”。章学诚亦明确提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命题，指出“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一肇脱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文史通义》内篇五）

道咸年间，史学家基于当时社会需要，打破中国“重古略今”的嗜古之弊，由“嗜古”而转向“究今”十分注意研究“现代史”，是以“尽收外国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为目的，亦注重史学的社会经世功能。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所以拓展域外史地学，是以“求法之所以衰，俾使为中国之殷鉴”为目的，借以寻求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匡时之策”。

针对宋代经学的“凿空附会之弊”，从明中叶始，实学家亦把“实事求是”的考据学（汉学）说成是“实学”。如明中叶考据学家杨升庵指出：“今之学者，循声吠影，使实学不明于千载，而空谈大误于后人也。”（《升庵文集》卷四十五）他针对宋学的“凿空附会之弊”，明确地把重实证的“汉学”说成是“实学”。

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明确地把乾嘉考据学称为实学，指出“值上（指乾隆皇帝）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之儒。”（《江慎修先生事略状》）“圣天子稽古右文，敦崇实学，昭昭乎有明验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在治经上，他把空谈义理的宋学说成